



百年学术精品提要

【文史与哲学卷】

BAINIAN
XUESHU JINGPIN TIYAO

主编 刘大椿 副主编 李稻

知识产权出版社



百年学术精品提要

【文史与哲学卷】

BAINIAN
XUESHU JINGPIN TIYAO

主编 刘大椿 副主编 李稻

知识产权出版社

《百年学术精品提要》编委会

主 编：刘大椿

副主编：李 韬

编委会常务编委：

黄兴涛 张 法 景跃进 胡锦光

高德步 洪大用 刘大椿 李 韬

编 选 导 言

一、百年学术精品调查

(一) 调查缘起

目前，关于人文社会科学的讨论莫衷一是、仁智各见。但是，对于当代缺乏大师、罕见精品的抨击，却是少有的一致。何谓精品？哪些著作称得上精品？这个问题似乎很简单，中国古代的《论语》，古希腊的《形而上学》，你能不认可吗？然而当代呢？就并非一目了然了。话说回来，如果我们竟然对当代的精品毫无概念，感觉模糊，那么，谈何精品，谈何评价！

解决此一难题的比较省事的方式，便是请名人们开列书目。

开列书目之举古已有之。被后人称作“唐末士子读书目”的《敦煌遗书 2171 号》大概是现在所见最早的推荐书目。常为人引用的，还有明代陆世仪在《思辨录》中所开的《十年诵读书目》、《十年讲贯书目》与《十年涉猎书目》，以及近世张之洞的《书目答问》，胡适的《中学国故丛书》，梁启超的《国学入门书要目及其读法》，章太炎在《华国月刊》上刊出的《中学国文书目》等等。

书目的出现使阅读的选择变得简单，同时也使它变得危险。书目往往为名人所开，即所谓通古晓今、德高望重、卓然不群之士。但这里有两个前提假设，一是对名人的信任甚至崇拜，二是承认名人因其具有的学术声誉和导师心态自然享有特殊的“话语特权”。值得提请注意的是，在一个传统需要重建、文化需要寻根的时代，

在一个充斥着现代主义“话语霸权”的时代，要想拿出一份能够经得起时间考验的、独具权威的“公共知识清单”，无疑是艰难的。而且这种艰难的背后隐藏着对新的“话语特权”的渴望和冲动，它们使得这项工作变得更加危险。

然而世上没有完美之事，危险是无法完全避免的。近百年来有无学术精品？哪些是学术精品？总得有一个答案。为了得到一份相对令人满意的精品参考书目，承担风险是必须付出的成本和代价。当然，如果既能综合名人名家（或单位）开列的书目，又能通过社会调查，用数字代替经验，用统计事实代替猜测，则有望降低危险的程度。

基于以上考虑，我们组织和开展了题为“百年学术精品调查”的调研活动。调研虽然是在有限范围和规模下进行的，但渗入了某些新的理念，加上了数量指标和统计分析，以期通过此次活动，或许能够拿出一份不完全是通过拍脑瓜得出的、有一定特点和参考价值的近百年来精品书目。

当然，如果仅仅是为了得到一份书目，那么这种调查的最大意义便是无甚意义。也许精品书目里的书的确能称得上是书中的精品，但任何书目自身都难成精品。毕竟学术之盛衰，当以百年论其沉浮，任何所谓的精品书目都不可能逃脱时代的局限。加之主客观两方面之限制，这里试图拿出的书目肯定差强人意。其实，我们调研的真正目的，并不是要推荐一份“公共知识清单”，而是想要讨论有关“学术精品”的话题，去思考中学与西学的异同，去梳理当代中国的学术历程，去唤起人文社会科学领域的“精品意识”，去挖掘“精品意识”背后的学理基础，去探讨人文社会科学学术著作的评价标准，去发现学术大师背后的精神底蕴。

（二）问卷结构和备选书目

这次调查，我们采用了问卷的方式。问卷主体包括4个部分：第一部分是调查人的基本情况，内容包括学历、职称、年

龄、学习或工作单位以及专业等。

第二部分是调查人的基本观点，在这个部分我们设计了几个问题，例如，“您认为学术精品的标准是什么”、“您认为进行百年学术精品调查的意义是什么”？在备选答案方面，我们作了开放式设计，既有现成的备选项，也给被调查人留下了足够的空间填写自己认为合适的答案。

第三部分是备选书目。考虑到很难按照学科类别对某些著作进行分类，例如罗尔斯的《正义论》，既可以把它划为政治学，也可以把它划为狭义的法学。为避免引起不必要的争议，我们选择了按国别对书目进行分类的模式。其中包括中国、美国、英国、法国、德国、奥地利、丹麦、俄罗斯、匈牙利、日本等国作者的 226 部学术著作。考虑到我们考察的重点是我国自身的学术问题，同时也根据中国现代学术著作在世界同期作品中的实际地位，把中外学术著作的人选比例定为 4:6 左右。

第四部分为调查对象的自选部分。如果调查对象认为有些学术精品在书目中没有反映出来的话，那么他可以在问卷的最后一部分填上自己认为称得上是学术精品的学术著作。

为保证调查的质量，我们前后进行了两次调查。

第一次是 2004 年 5 月在北京中国人民大学举行的“全国博士生论坛”期间进行的预调查。预调查的目的在于发现问题、完善问卷。

第二次是对北京地区 6 所在人文社会科学领域具有重要影响的研究机构的近千名博士生及老师进行的正式调查。

前后两次调查问卷的主体结构没有太大变化，变化的是备选书目。

预调查的备选书目包含 226 部近百年来在人文社会科学领域具有一定影响的学术著作。这 226 部学术著作的列出，首先是综合几所著名大学近年来拟出的精品书目，再参考部分知名学者的推荐书目，同时部分采纳具有不同专业背景的教授和博士的意见，在此基

础之上最终形成了预调查的备选书目。

借着“全国博士生论坛”在中国人民大学举行的机会，我们对来自包括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复旦大学、中国人民大学等高校在内的全国 50 多所高校中的 320 多名博士生进行了预调查。根据预调查中反映出来的问题，我们对备选书目进行了调整。

调整一：把原备选书目中得票在 10 票以下的书目删除，同时，保持中外精品书目大约 4:6 的比例。

调整二：参照预调查问卷最后一部分比较集中反映的情况，我们增加了部分书目，例如，约瑟夫·熊彼特的《经济分析史》。

根据调整后的备选书目，我们接着对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北京师范大学、中国政法大学、中国人民大学以及中国社会科学院等 6 所在人文社会科学领域具有比较重要影响的研究机构的近千名博士生及老师进行了正式调查。

（三）调查结果及其分析

正式调查共回收有效问卷 803 份，其中受访者属于哲学类的问卷 89 份，经济学类（包括理论经济学和应用经济学）的 160 份，教育学类（包括教育学、心理学）的 23 份，文学类（包括中国语言文学、外国语言文学、新闻传播学）的 95 份，法学类（包括法学、政治学、社会学、民族学）的 284 份，历史学类的 60 份，管理学类（包括管理科学与工程、工商管理、农林经济管理、公共管理和图书馆、情报与档案管理）的 72 份，还有理学及工学类的 20 份。

我们使用 SPSS 软件对回收问卷进行分析，整理出如本文附录所示的中外近百年来的学术精品书目。备选书目中只保留了得票数在 90 票以上的，包括中国部分 34 种，外国部分 59 种，另加自选部分提名数在 10 票以上的，计 13 种，一共 106 种。再强调一遍，这仅仅是用某种方法、按某种程序得出的一种书目，可供参考和议

论，不必太过认真。对形形色色的统计结果，这里愿意推荐一种简单的应对办法，即“不为所动，为我所用”。

在使用 SPSS 软件对回收问卷进行分析时，我们结合这次调研得到的中外近百年学术精品书目，对调研所揭示的问题提出了初步的思考结论，同时也对此次调研的局限性进行了反省。下面择要简述之。

1. 入选的和受关注的“学术精品”中，西方的特别是美国的居多

在调查问卷中，我们把中外“学术精品”书目的比例初定为 4:6 左右，目的在于尽可能关注和研究我们自身的学术问题，但从选择结果以及问卷第四部分（自选书目）反映的情况看，调查对象对国外著作的偏爱程度要远高于对本国学术著作的偏爱。

这个结果应如何解释？中国现代学术史大致是中国走出经学时代，儒学中心主义被颠覆，引入西方学术范式的过程。正如李慎之所说：“从文明，再具体一点说是哲学，发轫之初的所谓‘轴心时代’开始，中学与西学就各自循着自己的道路发展，西学是求真之学，中学是求善之学。或者换一句说法：西学一向从‘实然’出发，中学一向从‘应然’出发。这两个传统基本上互相隔绝而并行不悖地各自发展了 3 000 年。随着鸦片战争打开了中国的大门，中学碰上了西学，从此开始了相互冲突、摩擦、吸收、融合这样一个反复不已的过程，这就是现代的中国学术史。”^① 而我们现在所谓的“学术精品”，自觉不自觉地是以现代的或者主要是以西学的学术标准来进行评选的，若没有经过时间的筛选，在较短的时间里，青出于蓝而胜于蓝的结果并不容易实现。从这个意义上讲，中国现代的学术精品是比较少，但是并不奇怪。

在这里有必要提提“中学”与“西学”的区别。作为纯粹理性产物的知识，学问或者说科学，只应有真伪对错之分，而不应

① 李慎之：“什么是中国现代学术经典”，载《开放时代》1998 年第 5 期。

有中西地域之别，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讲，真理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但在人类发展的历史上，在政治、经济与文化相互作用的纷扰纠缠中，不同的历史文化背景又的确积淀下了不同的思想习惯，而不同的思想习惯又会形成不同的学术传统。在这个意义上，中学特别是儒家学术，与渊源自古希腊的包括人文学科、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在内的西方学术，代表了两种不同的学术传统。一般来讲，中学以践履为特征，知情意相结合，以伦理与政治水乳交融的“内圣外王”之道，通过严厉的、持久的甚至痛苦的人格训练来确立道德的高尚与人格的完美，直至实现“天人合一”的人生境界。与此相适应，中国的辩证法“是处理人生的辩证法而不是精确概念的辩证法。由于强调社会的稳定、人际的和谐，它们又是互补的辩证法，而不是否定的辩证法。它的重点在揭示对立双方的补充、渗透和运动推移以取得事物或系统的动态平衡和相对稳定，而不在强调概念或事物的斗争成毁或不可相容”^①。而西学是抽象思辨的学术，它的核心理念是独立与求真、是为学术而学术，在多数情况下它表达的是人类“认知的兴趣”，体现的是“方法重于结论”的基本观念。

在“亡国灭种”的威胁面前，在“科学”与“民主”的旗帜下，中国的学术注定要经历同西学不断地冲突、摩擦、融合的痛苦而反复不已的过程。“中国实用理性的传统既阻止了思辨理性的发展，也排除了反理性主义的泛滥。它以儒家思想为基础构成了一种性格——思想模式，使中国民族获得和承续着一种清醒冷静而又温情脉脉的中庸心理：不狂暴，不玄想，贵领悟，轻逻辑，重经验，好历史，以服务于现实生活，保持现有的有机系统的和谐稳定为目标，珍视人际，讲求关系，反对冒险，轻视创新……。所有这些，给这个民族的科学、文化、观念形态、行为模式带来了许多优点和缺点。它在适应迅速变动的近现代生活和科学前进道路上显得蹒跚

① 李泽厚：《中国古代思想史论》，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3年版，第289页。

而艰难”^①。传统的学术正是这样转换成新的学术传统，这是学术的宿命，这也是孱弱中国的宿命。在这个过程中，注定要痛苦的是学者，注定要反复的是思想。

反观国外，经济上强大的国家在学术上同样出色，而学术的强大又反过来影响这个国家与民族的命运。“观察一个民族的历史以至命运，自然以政治、经济、社会为主，但是要分析到最深层、最核心的问题，那就非从学术的出发点研究不可”^②。西方学术的精粹在于“求真”，是超越价值判断的对事物本源的探知，为知识而知识的结果是人文学科、社会学科以及自然科学的分化，原因很简单，对世界本质的把握需要从不同的方向、层次进行认知。正如盲人摸象一样，只有把所有盲人对大象的不同感受加以恰当的交流和组合，才可能形成对大象的完整认识。盲人越多，感受的部位越细，组合起来的形象也就越清晰。至于“民主”、“科学”、“自由”与“人权”这些具有普世意义的价值准则，也是西方学术的传统追求，作为文化中的核心组成部分，它们是支撑心灵家园的重要支柱，也成为书写世界历史文化的重要画笔。

美国的精品书目在西方部分占据着重要比例，这一点同美国于20世纪在西方的地位也是相当的。进入20世纪以来，整个西方世界的科学研究看起来像个盆地，而美国就是这个盆地的盆底。在重力的作用下，同自然科学一样，法学、经济学、政治学等社会科学的研究中心也都不可阻挡地从欧洲流向了美国。尽管血管里流淌着的仍然是同样的基督教义、民主法治、自由主义的欧洲之血，但是美国对其自身独有的人文精神资源的充分利用却开拓了大片的思想

① 李泽厚：《中国古代思想史论》，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3年版，第289页。

② 李慎之：“什么是中国现代学术经典”，载《开放时代》1998年第5期。

沃野，创造了思想的“山颠之城”^①。从这个角度讲，“美国之为美国，既是西方文明的一部分，又有其成体系的独特发展道路，对于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为己任的社会科学工作者来说，美国是一个极有吸引力的值得研究的典型。这对政治学、人类学、社会学、历史学、哲学等都适用”^②。自由的学术环境、多元的文化体系、求真的学术传统、强烈的自我批判、发达的大学教育等等因素的综合造就了美国学术的主流地位，给我们提供了许多思考点。

2. 中国部分的精品书目分布呈马鞍型

我们大致可以把中国部分的精品书目按其发表或出版年代分为3类：第一类是晚清以降至新中国成立前出版的，书目中的绝大多数都属于这一类。第二类书目是新中国成立至文革结束前出版的，这类书非常少，例如马寅初的《新人口论》和陈寅恪的《柳如是别传》。第三类书目是改革开放后出版的，这类书多为时新之作，面世不久，尚需假以时日考验，故而入选者也不太多。需要指出的是，这类书中倒是有部分书目成书年代比较早，但经过整理再次出版后影响较大，如费孝通的《江村经济》，原以英文发表于1939年，中文版问世则是20世纪80年代的事了；又如顾准的《希腊城邦制度》，他在1972年就已经带病完成了，但正式出版时间也到了1980年。

之所以20世纪前50年出现的学术精品比较多，应该同这个时期是中国学术史上的又一个高潮期有关。“晚清以来，中国遭受列强的侵袭，出现了空前的民族危机，于是志士仁人、英才俊杰莫不殚精竭虑，探索救亡之道，各自立说，期于救国，形成中国学术思

① 美国早期移民的梦想是建造一座“山颠之城”，以此向世界特别向英国显示一个神圣的共和国应该拥有什么样的秩序。尽管这种设想随着英国资产阶级革命的成功而失去了存在的合理性，但建造一座“山颠之城”以昭示世界的使命却成为美国人的一种信念。王晓德：“美国白人‘使命观’的历史和文化起源”，载《史学集刊》1998年第2期。

② “中国的美国研究”，载《美国研究》创刊号，1987年春，第19页。

想史上的第三次众说竞胜的高潮”^①。在这个时期，深受传统经学影响的“数百万吏士，问以大地、道里、国土、人民、物产茫茫如坠烟雾，目瞪舌不能语，况生物、心伦、哲化、光电、农工、商矿之有专长新书哉”^②。号称经世致用的中学无法承担救亡图存的历史使命，西学给西方世界带来的强盛成为促使国人迅速接受西学的药引，西方的学术观念、学术方法以及评估标准于是伴随着西方自然科学、社会科学的引进得以迅速地传播，“西学东渐”成为不可逆转的时代潮流。

学术高潮期的出现以大师辈出、思想攻错、学派纷呈为主要标志。20世纪20~30年代是人才辈出的年代，波澜壮阔的社会变革、汹涌澎湃的文化交融、前无古人的思想启蒙构成了一幅纷纭复杂的图景，为那些通古今、融中西的学者们创造了一个可以充分施展才情的学术舞台。在这个舞台上挥舞着的是“民主”与“科学”的旗帜，洋溢着的是“自由”与“独立”的氛围，闪烁着的是思想与智慧的光芒，活跃着的是康有为、梁启超、章太炎、王国维、蔡元培、鲁迅、胡适、陈寅恪、梁漱溟、熊十力、钱穆、金岳霖、汤用彤等学术大家。诚如陈平原所讲，当时的中国学界“新的学术范式已经确立，基本学科及重要命题已经勘定，本世纪影响深远的众多大学者也已登场”；但好景不长，“随着舆论一律的推行，晚清开创的众多喧哗、思想多元的局面也不复存在，取而代之的是立场坚定、旗帜鲜明的党派与主义之争，20世纪中国学术从此进入了一个新的年代”^③。

于社会环境而言，20世纪头30年是混乱的，这种混乱表现为

① 张岱年：“国学大师丛书·总序”，转引自汤学智：“90年代文学理论批评走向考察（待续）”，载《文艺评论》2000年第3期。

② 康有为：“日本书目志·自序”，载《康有为全集（第3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版，第584页。

③ 陈平原：“西学东渐与旧学新知——中国现代学术之建立”，载《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8年第1期。

国力日衰、积贫累弱、外族入侵、内乱频仍，但于学术环境而言，这种混乱又表现为自由研究、独立创造、兼采中西、超越彼此，在“淆乱粗糙之中，自有一种元气淋漓之象”（梁启超语）。可以毫不夸张地讲，这个时代是 20 世纪中国学术思潮迭出、百家争鸣的时代。同历史上的春秋战国时期、汉末魏晋时期一样，动荡的社会环境带来的往往不是学术天地的萎缩，而是意识形态控制的废弛。质言之，学术之繁荣，并不一定以社会平稳划一为前提，反之，自由之学术环境、多元之思想氛围，方是学界大家辈出、精品频现的重要原因。想来这个理由既可以作为解释 20 世纪前半叶精品书为何较多的原因，也可以回答为何“文革”时期精品书几近绝迹的疑问。

始自 20 世纪 70 年代末的改革开放给中国的学术带来了新生的契机，一批在文革前功底就较好、文革中又千方百计没有荒废学业的学者，一旦摆脱了文革的阴影，其学术的创造力便又被重新唤起。思想的解放、全球化的冲击、市场经济的洗礼，都促使中国学术取得长足的进展。对西方学术的引进，对中国传统文化研究的复兴，具有世界意义的学说在中国的本土化等等，使得中国的学园一扫荒芜，重又变得生机勃勃。尽管在这种热闹中不乏浮躁，但较之于文革之中和文革之前，中国的学术界在体察了社会动乱与变革、经历了“欧风”与“美雨”来袭的躁动不安之后，那些倾心于学术事业的学人最终沉潜下来，对学术领域进行了新的挖掘和拓展，使之不仅同中国传统的文化衔接起来，而且逐渐具备了同世界对话的品格。中国的学术一旦走上了其应有的发展轨道，学术精品的涌现便只是一个时间问题了。当然，正如我们现在还在反复咀嚼品尝 80 年前的精品一样，当前的精品能否成为真正的精品，还有赖于时间的考验。不过，随着学术禁区的逐步突破、学术环境的日益宽松，相信中国的学术之路会越走越好，学术精品也会越出越多的。

3. 中国部分的精品书目中属于人文学科的较多，社会科学的较少。此外，一些思想性、政治性较强的著作得票较高

调查中，费孝通的人类学著作《江村经济》在中国书目部分中

得票数最高。费孝通的导师布·马林诺夫斯基认为该书“将被认为是人类学实地调查理论工作中的一个里程碑”。其中的“某些段落确实可以被看作是应用社会学和人类学的宪章”。^①老师对学生的钟爱难免会导致溢美之词的出现，但这本书的确是“中国老一代社会学家力图了解中国‘社会变迁’过程的最早尝试之一”，“同时也在中国现代社会科学的形式中占有一席独特的位置。因为该书事实上是三十年代初吴文藻等中国学术前辈力倡社会科学本土化的一个直接成果”。^②在这部书中，费孝通认为，中国传统的经济结构是一种“农工混合的乡土经济”，而非纯粹的农业经济。中国的农民需要“乡土工业”的支撑。“乡土工业”的崩溃导致农民无法维持其最低的生活标准，而这，正是近代中国的根本问题。在严峻的现实的“三农”问题面前，这么重要的一部学术著作受到足够的关注是正常的也是应该的。

尽管作为一部重要的社会科学领域的学术著作，《江村经济》受到了其应有的重视，但就整体而言，尤其是在调查对象的自选部分，社会科学领域（如经济学、政治学、法学、社会学等）的书目较之人文学科领域（如文学、历史学、哲学等）来说还是少了许多。其实不光这份书目是这样，李慎之在评论刘梦溪主编的《中国现代学术经典》一书时曾指出：“从第一批列为‘经典作家’的名单看，基本上也没有社会科学家，除非把历史学算上（而在有的国家，历史学往往算在人文学科的范围内，即中国古代的所谓‘文史之学’，或现代之所谓‘文史哲’）。此外，法学、经济学、社会学……一概没有。”^③无独有偶，陈平原在谈论现代学术之建立的过程中，开列的代表人物名单是康有为、梁启超、

① 布·马林诺夫斯基为《江村经济》所作的序，费孝通：《江村经济——中国农民的生活》，商务印书馆2001年版。

② 甘阳：“《江村经济》再认识”，载《读书》1994年第10期。

③ 李慎之：“什么是中国现代学术经典”，载《开放时代》1998年第5期。

章太炎、罗振玉、王国维、严复、刘师培、蔡元培、黄侃、吴梅、鲁迅、胡适、陈寅恪、赵元任、梁漱溟、欧阳竟无、马一浮、柳诒徵、陈垣、熊十力、郑振铎、俞平伯、钱穆、汤用彤、冯友兰、金岳霖、张君勱等，与《中国现代学术经典》所开列的名单大体一致，并且也和刘梦溪一样，对于社会科学则注明是“另当别论”的。^①

究其原因，大致有二：首先，社会科学本身的幼稚导致了其在近代中国学术史中影响力的式微。严格来讲，人文学科与社会科学并无本质的区别，只是其研究对象的侧重点稍有不同。一般来说，人文学科（如语言学、文学、历史学、哲学等）更注重研究社会的主体——人的尊严、价值、个性、心理等主观状态，而不像社会科学（如经济学、政治学、法学、社会学等）那样主要研究群体活动及其与客观世界的相互联系规律。^② 进入现代以来，西学对中国传统学术的一个重要冲击就是打破了过去按照经、史、子、集进行分类的传统，代之以现代学科的分类方法，把“文学的归文学、哲学的归哲学、史学的归史学”（胡适语）。在这里，无论是数学、天文学、物理学、地理学等自然科学，还是社会学、法学、经济学等社会科学，其概念大都是外来的产物。于我们自己来讲，这些都属于新知。然而，文学也好、哲学也罢，中国并不缺乏可以贴上相应标签的学科体系，人们可以肤浅甚至生硬地在中国传统学术的基础上建立起所谓“现代学术”的框架。但我们显然还没有创造出可以应对经济学、法学、社会学等社会科学的学术语言，从学术概念的确立到学术术语的使用，从学术体系的建立到方法论的采用，少有自己的东西，在学术的生命周期中还处于幼年。这种事实上的幼稚陪

① 陈平原：“西学东渐与旧学新知——中国现代学术之建立”，载《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8年第1期，第49页。

② 人本主义是人文学科的最早雏形。19世纪下半叶，以反对禁欲主义和封建的登记制度、追求个性解放、提倡世俗文化为主要内容的人本主义逐渐发展成为一种主要研究人的思想信仰、价值、人格、尊严、感情的专门学科。

伴着中国的社会科学走完了整个 20 世纪，贯穿了中国现代学术史的始终，同时也决定了我们在这些领域不可能留下多少可供后世瞻仰的精品。要承认这个结论是困难的，甚至是痛苦的，但我们不得不面对一个事实，在社会科学领域，西方人很少援用中国典籍，甚至在根本不懂中国文化与学术的话语系统的情况下，依然可以控制和操纵世界学术的市场。西方学术史的近现代演进基本上自成一体，几乎独立于东方尤其是中国；而反过来，中国近代以来的文化与学术的演进却处处在西方的影响之下，中国的学者如果不与西方话语在某种程度上“接轨”，则无异于把自己关在世界文化与学术的大门之外。尽管经过上百年的消化和吸收，社会科学已经成为中国现代学术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但毫无疑问，“中国学派”依然是一个光荣的梦想，中国的社会科学要摆脱其幼稚的形象，实现真正意义上的本土化，如同中国社会要实现真正意义上的现代化一样，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其次，近代中国学界的启蒙性质导致了社会科学地位不高。无论是五四时期还是 20 世纪的 80 年代，中国的学术界都充满了呼唤“民主”与“科学”的启蒙色彩。什么是启蒙？康德说：启蒙就是人类摆脱自己加之于自己的不成熟状态。什么是不成熟状态？不成熟状态就是我们在需要运用自己理性的领域却接受了他人的权威。我们为什么会处于不成熟的状态？原因是我们缺乏运用自己理性的勇气，或者说我们太容易习惯于接受（常常是被迫接受）权威意识的统治。启蒙就是让我们颠覆权威，怀疑主宰，启蒙的精神就是怀疑的精神，就是批判的精神。启蒙之于清末的中国而言，就是怀疑中学，颠覆传统，重新行使思想的权利，呼唤“民主”与“科学”的回归。可以说，对“民主”与“科学”的呼唤和企求贯穿了整个 20 世纪中国的学术史。从力倡批判和怀疑精神的意义上讲，启蒙一直是中国未竟的事业。正是在对“民主”与“科学”的向往中，中国学术开始了向现代转型的过程。“学术，无论是自然科学、社会科学、人文科学，都无不涉及事实真理与价值真理的关系问

题。……在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领域，事实是第一性的，评价是第二性的”^①。较之于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更为关注人类个体精神与价值评价的人文学科显然在这个痛苦的、漫长的启蒙的过程中，更容易受到欢迎，影响力也更大。举例来讲，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于1919年2月正式出版。不到两个月的时间即再版，至1922年，人们在市面上看到的《中国哲学史大纲》就已经是第八版了。正是在这本书中，胡适对墨子非命论中的自由意志进行了肯定、对“孟子的政治哲学很带有尊重民权的意味”进行了颂扬。尽管此书并没有真正地突出中国古代哲学的特点，但这种不失时机地彰显中国传统哲学中近似民主的观念和个人主义的做法，无疑赢得了当时和后世的重视。

（四）对此类调查方法之反思

对于这次调查，除了审视和分析上述现象，还需要把目光转移到调查本身。

任何书目都有局限性，只要时间没有停止，书目的内容就必须不断变更，因为人的生命有限，不可能把书目中的所有著作通读一遍；因为人的思想无限，不可能在先人思想的荫庇下久留。这次调查得出的书目，同样有着这样那样的局限。

局限之一，问卷模式的局限。本次调查采取的是问卷模式，要想让调查对象认真答题，我们首先要拟出备选书目，其次必须要精简书目数量，因为调查对象的耐心一般是容不下超过10页的备选书目的。在选择备选书目时，选择人不同的专业背景、不同的关注领域，会形成不同的选择偏好，这种偏好又会造成书目内容的残缺，造成部分应该被选上的书目的缺失。此外，预调查问卷的书目是226部学术著作，显然，它们同中外百余年来的学术精品之间无

① 许苏民：“也谈学术、学术经典、学问与思想——对梁启超、严复、王国维观点的质疑兼评‘现代学术经典之争’”，载《开放时代》1999年第4期。